

# 中國的挑戰： 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芻議<sup>1</sup>

趙月枝

## 摘要

「中國崛起」對具有歐美中心主義傾向的傳播研究、包括這一領域中具有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傳統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提出了什麼樣的挑戰？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文首先指出中國社會主義實踐與傳播政治經濟學兩者共有的國際性和跨文化性，並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框架的基礎上簡要勾勒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的基本內涵。隨後，本文從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的角度圍繞「中國的挑戰」，討論傳播與意識形態問題在中國國家性質定位中的關鍵角色，傳播與階級、民族和國家之間的互構關係、以及傳播研究中的歷史觀與傳播與文化政治等一系列問題。在結論部分，本文討論2008年資本主義危機以來共產主義思想在西方批判知識界復興的新趨勢，並進而指出中國只有通過

---

趙月枝，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教授，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中國傳媒大學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研究興趣：傳播理論與社會理論、傳播政治經濟學、國際傳播、傳播政策、文化產業、傳播技術與社會發展。電郵：yzhao@sfu.ca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28期(2014)

繼承社會革命遺產和實現「人民民主」諾言走出一條超越資本主義的道路，才能為人類文明作出新貢獻。

關鍵詞：傳播政治經濟學、階級、民族、國家、文化政治、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中國崛起

## **The Challenge of China: Towards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Yuezhi ZHAO

---

### **Abstract**

The shared internationalist and transculturalist orientations underpinning bo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s a critical research tradition in the West and China's experiment with socialism are underscored in this article to identify what type of challenge “the rise of China” pose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cluding its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tradition, which is strongly grounded in Marxist praxis. Subsequently, the core elements of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are briefly outlined. The pivotal role of communication and ideology in the struggles over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state, the mutually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the critical categories of class, nation, and state are addressed in this article by intertwining theory and a critical literature review, as well as by analyzing concrete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In addition, issues concerning history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re addressed.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noting how the idea of communism has regained currency in critical Western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the

---

Yuezhi ZHAO (Professor and Canada Research Chair)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hangjiang Chair Lecture Professor)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Research interest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social theory,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policy, cultural industrie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ftermath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arguing that the only way for China to make a new contribution to human civilization is to revitalize its social revolutionary legacies and fulfil its promise as a “people's democracy.”

**Keywords:**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class, nation, state, cultural politics, capitalism, socialism, the rise of China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Zhao, Y. (2014). The challenge of China: Towards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8, 151–179.

正如我所假設的，毛澤東正確預測了中國社會主義鬥爭的艱難曲折。一切似乎都很明顯，動力正在積聚，它將啟動「文革」結束後階段的階級鬥爭。

——達拉斯·斯邁思 (Smythe, 1981: 247)

我不會把賭注押在中國的任何特定結局上，但就它的發展方向而言，我們必須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

——喬萬尼·阿瑞吉 (Arrighi, 2009: 84)

傳播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學的基礎理論，它既有很強的學術性，又強調社會實踐性。作為這一領域的最重要奠基者，加拿大學者達拉斯·斯邁思 (Dallas Smythe) 發起了在本領域發展史上有里程碑意義的「盲點爭論」，激發了馬克思主義傳播理論中有關如何堅持唯物主義立場和勞動價值論這些核心問題的持久討論。同時，他以一位社會主義實踐者的身份和國際主義的情懷兩次考察中國，並力圖以自己的政策建議參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與傳播實踐。後一點，體現在他一篇題為〈自行車之後，還要什麼？〉(After Bicycles, What?) 的文章中。正是這篇他生前並沒有公開發表的中國考察報告，使他在批判傳播學界成為傳奇人物 (Guback, 1994: 227)。倘若「盲點爭論」屬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共同體內部北美的政治經濟學者與他們的英國同行之間的一場學術論爭，那麼，斯邁思在中國的經歷則使得他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政治實踐聯繫了起來。這不僅展示了中國社會主義實踐與傳播政治經濟學兩者共有的國際性和跨文化性，更預示了這兩者之間從一開就結下了不解之緣。

斯邁思於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期間首次到中國研究有關意識形態和技術哲學方面的問題。當時，正值中國重新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前夕。這一融入以1972年2月美國總統理查·尼克森 (Richard Nixon) 訪華和中美關係的破冰作為序曲，以「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在發展戰略上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大變化和以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經濟結構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積累模式的形成而達到高峰。斯邁思通過對科學、教育、媒體等不同領域中官員和學者的訪談

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雖然這些領域好像都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但「我們共同的資產階級思想文化遺產」，繼續阻礙中國學者去理解技術的政治本質(Smythe, 1994: 238)。斯邁思本能地感覺到，這可能會成為中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一個問題，並且這還不僅僅只是一個學術層面的問題。為此，斯邁思向中國官方提交了他的考察報告，作為一份來自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一位憂心忡忡的「家庭」成員的友善批評(Guback, 1994: 229)。在報告中，斯邁思討論了技術的社會性與西方消費資本主義的不可持續性，希望中國在解決溫飽問題後——也即有自行車之後——能把社會發展的重點放在公共物品和普通民眾的需求的滿足上，而不要走消費資本主義的老路。儘管中國政府從未對此直接回應，但是，對於「自行車之後，還要什麼？」這個有關中國發展道路的寓言性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間接給出了一個振聳發聵的回答：「當然是汽車！」(以及私家車所體現的一切消費資本主義社會關係。)

時至今日，傳播政治經濟學正面臨着由中國的世界歷史性轉型而帶來的「中國的挑戰」。本文要探討的是，在全球政治經濟中扮演着上升角色的中國會為21世紀的傳播學提出什麼樣的理論難題？多年以來，我曾試圖超越該領域的歐美中心主義從而為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分析貢獻一己之力(Chakravatty & Zhao, 2008; Zhao, 2008, 2009a, 2009b, 2010; 趙月枝, 2011)。如果傳播政治經濟學是關於傳播與政治經濟權力關係相互構建的研究的話，那麼，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分析(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則從批判政治經濟學和後殖民主義以及人類學等研究領域汲取理論資源，聚焦傳播與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因在不平等的世界體系中的碰撞，而產生新的社會文化形式與實踐這一過程的相互構建關係。

這裏有幾個關鍵字。首先，雖然這裏的“transcultural”一詞也譯為「跨文化」，此語境中的「跨文化」與學界熟知的「跨文化傳播」中的「跨文化」不同。前者與英文中的“transculturation”一詞相關，有轉型(transformation)和培植(culturation)的含義，強調的是一個社會體系的動態轉型與歷史性演變，而「跨文化傳播」只強調兩種文化間的溝通與「跨越」(cross)，並往往因假定某些去歷史化的文化特質的存在而隱含

文化本質主義的傾向。其次，如果「跨文化傳播」更多地關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非政治性或去政治化條件下的）人際傳播的話，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研究不但秉承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總體性關注和視政治經濟權力以及階級、社會抗爭等為最基礎的問題，而且把這些問題放在全球視野中和不同文化間的互動維度來分析，從而賦予國家、民族、種族、全球治理、地緣政治、全球正義等議題更核心的地位；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關鍵字是「碰撞」，而且這一「碰撞」是在不平等的世界體系中進行的。更具體地說，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分析希望在關注源於西方的強勢資本主義體系通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等過程與其它處於弱勢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產生碰撞的歷史過程中，探討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東方和南方國家的特殊性、現實多重性、挑戰資本主義的可能性、以及這種挑戰的社會主體性等問題。在這一基本理論框架中，本文圍繞「中國的挑戰」，討論包括中國的國家性質、階級、民族之間的關係、以及歷史與文化等一系列問題，而後，作為結論，本文討論社會主體問題以及備選方案。

## 西方、其他國家與中國國家的核心地位及其性質

「就像一個巨大的油罐，世界正在發生轉向。世界經濟的新增長極（pole of growth）已經出現在南方和東方。全球化曾經屬於西方，然而現在，這個榜單正在逆轉。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其他世界崛起』的時代」，社會學家彼特斯（Jan N. Pieterse）這樣寫道（Pieterse, 2009: 55）。但是，是什麼讓「中國崛起」如此引人注目？顯然，中國的人口總量、領土面積，和複雜多樣的族裔等特質都不是充分的答案——畢竟，印度，這另一個新興力量的中心同樣擁有上述一切特徵。在這裏，一個最關鍵的差異是：「現代印度國家……從未擁有像中國那樣的政治大一統歷史遺產和列寧主義國家的近代經驗。」（Cheek, 2006: 13）

中國在戰後資本主義國際體系中的位置來之不易。這是現代中國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所發動的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所獲得的最初戰利品。隨後，中國共產黨不僅因領導了旨在推翻階級壓迫的社會革命贏得了在中國大陸的國家政權，而且贏得了在聯合國代表由中華

民族組成的現代國家的資格。誠如毛澤東所言，為了走獨立自主的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方面與西方資本主義作鬥爭，另一方面與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相抗衡。在這樣的情境下加入聯合國，中國離不開眾多非洲後殖民民族國家的手足情誼：是非洲黑人兄弟把中國抬進了聯合國。因此，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因直接回應了中國底層社會、特別是農民階層對平等正義的熱切渴望，而為其政權奠定了國內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基礎。另一方面，在國際上，中國共產黨政權對后殖民國家民眾的民族平等與解放事業也有歷史性債務，而這些民眾對更平等的國際秩序的熱望則體現在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及其後興起的第三世界國際主義運動中。在經歷了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和向西方資本主義「開放」後，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中國領導層能否在不失去在內政和外交上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前提下，公開拋棄其共產主義外衣，並把自己構建成跨國資產階級的成員，而全面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秩序？對傳播政治經濟學而言，政治與意識形態領域同經濟領域間的「相對獨立性」問題，以及更重要的有關中國國家的階級性質的問題便由此凸顯出來。

在中國學界，雖然傳統馬克思主義有關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因其教條化弊端而遭遇口誅筆伐；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正是許多最強烈的自由主義反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堅持中國的市場經濟基礎已與中國的政治與意識形態不相適應的觀點，從而在不知不覺中堅持了教條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該立場的堅持者無視或根本不願正視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及其「反作用」——包括中國國家中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革命歷史遺產對資本主義市場關係在事實上的調節、抑制或在修辭上的煙幕彈作用。

同時，無論一般的西方社會理論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都沒有必要的理論資源來解析當代中國。在西方社會理論界，早期試圖發展國家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可謂內外交困，被湮沒在各種消解國家的理論範式中：一方面，全球化理論唱衰國家角色；另一方面，後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理論以及後現代主義理論將學術焦點從「國家與階級鬥爭轉移到了權力的微觀物理學以及身份形成的問題上」(Jessop, 1991: 91)。這兩種思潮共同導致了國家理論的「日漸式微」



(Panitch, 2002: 93)。傳播學科裏，有關後殖民民族國家的理論盲區同樣顯著，這不僅體現在一般的發展傳播學理論上，也體現在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範式中。諾登斯頓(Nordenstreng, 2001: 155)曾指出，在早期理論家所提倡的文化帝國主義範式裏，國家這一概念一直未能得到充分解析；諾登斯頓的學生阿漢森(Alhassan, 2004: 61)也認為，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某些關鍵性文本，在民族國家、民主、公民權以及主權等概念的闡釋上，往往語焉不詳，曖昧不明；斯巴克斯(Sparks, 2007: 193, 203–204)則對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家提出了更加尖銳的批評，指責他們沒有把1991年之前的美蘇衝突理解為「不同帝國形式的鬥爭」，對社會內部的權力分配一直緘默不語，以及把發展中國家中的國家集權式的解決方案視為「美國資本主義」的替代，而非補充。

不過，斯巴克斯的批判也有失偏頗。事實上，並非所有批判傳播學者在闡述文化帝國主義的過程中，都本質化地理解第三世界國家及其民族文化，並把它們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跨國資本主義文化機械地、去歷史化地對立起來。文化帝國主義的早期批判關注後殖民社會的「統治階層」如何「被引誘、被施壓、被協迫，有時被賄賂去打造本國的社會體制，使其適應、甚至推廣現代世界體系統治中心的價值與結構」(H. Schiller, 1976: 9)。因此，這一批判「接近——[雖然]事實上一直沒有成為——跨國階級鬥爭理論」(D. Schiller, 1996: 101)。正如丹·席勒(D. Schiller, 1996: 101)所闡述的，這一理論立場與著名的第三世界反殖理論家法農(Franz Fanon)的一貫堅持交相呼應。法農認為，新獨立的國家有必要時刻提防與遏制新生資產階級以及特權階層的產生。恰恰正是在此情境下，我們才能理解為何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斯邁思會被「無產階級政治」的宣傳說辭及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掛帥」地位深深吸引，並衝破冷戰藩籬，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研究中國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傳播問題。為了理解中國國家內部「走資派」與「走社會主義道路者」之間鬥爭的勢態，他分析了在中國發展道路中居於領導地位的官員與學者的意識形態取向，以及這一階層在技術的社會性及知識與權力關係等問題上的認識水準和理論素養。

今天，要探討「中國崛起」對當代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提出的挑戰，首先必須分析資訊資本主義時代下中國國家的性質。如上所述，

中國國家在民族革命、社會革命和堅持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鬥爭中鍛造而成。如果中國的國家權力使其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積累時代一躍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極，那麼也正是這個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不確定性，使「中國崛起」對於不斷演進的全球資本主義秩序而言，顯得如此令人不安。新自由主義的破產和中國國家抵抗全盤新自由主義化的能力——或言之，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精英因為中國革命遺產的影響和民眾的抗爭而未能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最大規模地、全面地實現新自由主義化這一事實，已將中國推向了全球政治經濟和輿論的中心。儘管官方一直抱持「不爭論」的意識形態立場，有關中國國家發展方向的社會鬥爭卻從未中斷過。雖然官僚階層、資本階層和管理階層在國家中的權力不斷上升，但是，隨着底層大眾希望通過抗爭重新找回實現他們階級權力的獨特形式，領導層也試圖重構文化領導權，從而贏回來自社會底層的支持。因此，一方面，自由主義者積極推動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改革，促使中國的「上層建築」與在很大程度上業已資本主義化的「經濟基礎」相適應；另一方面，全盤資本主義化的經濟改革不能被徹底推進的危險依舊存在。總體而言，正如哈維引用李靜君的研究所言，中國的底層社會抗爭的主要目標不是政權更迭，而是希望共產黨「實踐其自身的革命綱領，反對外國資本家、私人利益和地方官僚」(大衛·哈維，2010：173)。因此，進入21世紀以來的中國精英與大眾傳播政治，需要被理解為一場正在展開的鬥爭的一部分，而這一鬥爭，既圍繞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階級基礎和國家的性質，也圍繞中國變革的未來方向，這兩者是雙面一體的關係(Zhao, 2008a, 2008b)。

### 階級、民族、與國家：中國及全球維度

如果中國國家的階級性質及其在資本主義積累模式的轉變中的角色，是任何有關「中國崛起」討論中一項至關重要的議題的話，有關國家(state)與民族(nation)之間關係的議題同樣重要，因為大多與文化帝國主義相關的爭論最終都落在關注民族國家間不平等的問題上。「民族」概念很少被充分地理論化。更遺憾的是，這一領域的最新前沿，特別是莫斯科(Mosco, 2009)所描述的諸如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化、女

權主義以及勞工立場在傳播分析中的發展，仍舊忽視國際鬥爭、民族與民族主義等問題。德塞 (Desai, 2008: 398) 更一針見血地指明，以研究民族與民族主義為核心的文化研究，同以階級為中心、圍繞國家與國際發展而展開的政治經濟學之間，存在着一種無益的學術勞動分工。「中國崛起」昭示如下現象：一個貧窮的國家在國內階級不平等情況加劇的同時，成功地在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中「崛起」；同時，這還是一個擁有着難以想像的民族、性別、城鄉與地區差異的多民族國家，它的海外移民的人口規模與經濟實力在世界上無可匹敵，何況這些移民或多或少還與中國保持某種經濟與文化聯繫。在傳播領域直面「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挑戰就意味着，我們要對中國國內外複雜交互關係中諸如階級、民族、地域、城鄉以及身份差異等文化傳播問題，進行批判性檢視。

正如林春指出，在中國，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與發展主義在歷史上緊密相連。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共產黨人屬於民族主義者。考慮到帝國主義國際體系裏中華民族的「階級」位置，「中國革命……首先是一場民族革命，而後才是一場社會革命，而不可能相反」。同時，中國共產黨人「堅信如果社會利益與民族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社會利益必須讓位於民族利益」(Lin, 2006: 40)。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今在憲法中依舊被定義為一個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民族主義擁有一份牢固的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遺產。這一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上得到充分體現：這面國旗由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四顆星圍繞着一顆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大五角星組成，它恰恰強調了構成這個國家的國民——人民——的階級特性，而並非文化或者「民族」特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並參與「第三世界」歷史性自我認同運動，立基於被壓迫民族的國際民族主義 (international nationalism)，它迥異於歐洲民族主義。如果國旗圖案突出了這個國家國民的階級性，那麼，天安門城樓上的一對口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和「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恰恰是作為立國原則的「國際民族主義」的最好表達。<sup>2</sup> 帕莎德 (Vijay Prashad) 認為，「如果歐洲民族主義者想當然地認為一個民族 (或許也被稱為一個『種族』) 只有在一個國家的組織動員下，

才可能成為他們的民族」，那麼，後殖民民族主義者則創建了另一套民族理論，「這套理論由兩個要素構成：一是他們與殖民主義抗爭的歷史；一是他們實現正義的綱領」(Prashad, 2007: 12)。對中國而言，不但「作為一個自覺實體的中華民族是在中國近現代的革命歷史中產生的」，而且，「這裏的革命是雙重的，既包括以民族獨立為目標的民主主義革命，也包括以實現平等為目標的社會主義革命。反過來說，離開了中國革命的歷史，中華民族就無法被敘述，甚至這個概念本身都不能成立了」(李北方，2013)。

同時，現代中國的「民族」概念也受到中華帝國的政治統一與民族文化融合悠久歷史的制約。汪暉的研究(2004, 2008)早已清楚地闡明，從擁有民族融合悠久歷史的中華帝國中塑造出一個現代中國多民族國家的過程，與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存在着根本的區別。從章太炎到孫中山，早期的中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最初都致力於建立一個單一文化的漢民族中國政權，但他們很快意識到這將導致中國的瓦解。因此，建立於1912年的現代中國國家的第一個化身——中華民國，便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同樣，受到列寧的民族自決觀念的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曾試圖仿照歐洲的民族國家建立一個共產主義政權。然而，通過革命鬥爭他們很快發現，中國照搬歐洲民族國家的模式是行不通的。尤其在長征期間，大部分漢族革命者在與中國西南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的密切接觸中發現民族融合的現實性。因而，在關於中國共產黨革命領導權的闡述中，民族融合的悠久歷史以及對超越民族文化身份的階級友愛被突出地置於優先地位。這一做法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就「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案絕然不同於現已解體的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所實施的民族政策。正如汪暉(2013)在論及帝國與民族國家這兩個範疇的關係時指出：

在第一次世界後各大帝國在「走向共和」過程中分裂為多個民族國家或加盟共和國不同，辛亥革命在「五族共和」的口號下通過「大妥協」完成了清朝與民國的主權轉讓，主權連續性成為此後國內政治博弈的規範前提。在蘇聯崩潰後，中國是前20世紀農業帝國中唯一一個將這種連續性維持至21世紀的國家。

今天，雖然中國主流話語「容忍甚至迎合了」中華民族敘事中的去政治化和將中國革命汗名化的立場（李北方，2013），但是，中國國家政權不僅一直警惕着西方世界「西化」中國的企圖——即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強加給中國，而且警惕着其「分化」中國的野心——即通過支持台獨或者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獨立運動分裂中國。

當下，中國國家政權臨着如何平衡經濟增長與社會和生態公正，以及如何處理相互衝突的階級利益與多元文化身份等一系列難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國家在回應西方自由民主話語與歐洲中心主義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民族主義觀念，並打擊具有跨國背景的西藏種族/民族主義運動的過程中，一方面持續壓制階級話語，另一方面不得不回歸其革命敘事，在宣傳中重續與藏族同胞的「階級情誼」（趙月枝，2012）。2009年1月，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將3月28日設立為西藏「農奴解放日」，這一舉動可謂意味深長。官方媒體將之描述為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於1959年3月10日鎮壓了「以達賴為首的西藏反動上層集團為保住政教合一的農奴制永遠不改」而「悍然發動的旨在分裂祖國的全面武裝叛亂」，以及「領導西藏各族人民一邊平叛一邊進行民主改革」，從而「使百萬農奴翻身獲得了解放」的紀念之舉（新華社，2009）。在這裏，中華民族的敘事好像又找回了其政治和歷史內核；而這裏的「民主」宣稱顯然也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話語所能包容的。

林春（Lin, 2006: 136）曾指出，「倘若中華人民共和國使人民深感失望，結果都證明不是因為她違抗了西方政府和它們殖民擴張的模式，而是因為她背離了她自己當初的遠見卓識與對民主的承諾」。以此衡量，那種以為「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是通過自由、公平和競爭選舉而產生，那麼她就不可能成為民主國家」的觀點，顯得不知所云。相反，「不能忽略中國社會主義任何真正的民主元素，並從這個國家未竟的民主事業的角度，歷史性地看待這些元素」將更加切合題意（Lin, 2006: 197）。正是在繼續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議程下，林春（Lin, 2006）把「人民民主」當作中國未竟的事業，而胡鞍鋼則提出了與西方「公民社會」相左的「人民社會」概念，並認為「人民社會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社會」（胡鞍鋼，2013）。



中國激化的社會鬥爭和環境衝突以及新領導集體的新思想和政策顯示出，沒有中國底層社會階級的崛起，所謂的「中國崛起」不可能在政治層面上得到真正實現，「中國夢」也絕不可能是「美國夢」的翻版。隨着社會矛盾的深化，哪怕中國政府實施更加嚴格的媒體審查制度，都無法再遏制中國底層社會階層及其有機知識份子為社會正義、環境可持續發展以及一條更加公平的發展道路而發出的聲音。李民琪甚至樂觀地(2008:92)認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大量產生，及其不斷增強的談判權力與組織能力，將不僅「使全球權力平衡再次有利於全球工人階級」，並使資本積累愈加困難，最終導致我們所知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制度的「終結」。如果地球的生態容量不能容納以西方消費資本主義為模板的「中國崛起」或者「世界其餘部分的崛起」，那麼斯邁思在〈自行車之後〉一文中，對轉變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關係，以及轉變其科技創新制度的必要性的激進堅持，在今天就顯得更加迫切與中肯了(Zhao, 2010)。同時，針對西方資本主義城鄉割裂發展模式所帶來的社會文化危機和生態危機，如何克服城市中心主義傾向，重構農民的主體性和新型的城鄉互哺關係，從而實質性地實現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成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關鍵問題(呂新雨、趙月枝，2010；趙月枝，2011:291-294)。

這反過來又向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分析提出另一個緊迫的問題：當商業化的媒體系統因作為命根子的廣告收入減少而成為全球經濟危機的受害者時，傳播民主化的挑戰與機遇又會是什麼？我們已經清楚看到，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西方主流媒體不僅不能對種種經濟泡沫起到應有的「制止」與監督作用，甚至或多或少地支持「反恐戰爭」和煽動種族仇恨。基於此，我們有理由擔心，在為同中國展開「即將到來的衝突」製造輿論，進而持續動員美國的民族主義和白人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以取代國內階級衝突的道路上，西方媒體、尤其是美國媒體，究竟能走多遠？哪種媒體結構、實踐和文化情感有助於美國以「非災難式道路」來處理它不可避免的衰落問題？(Arrighi, 2009: 83)

不僅如此，為了克服生產過剩的危機，中國政府一方面希望通過增加中國社會底層階級的福利來刺激國內消費，另一方面向南半球欠發達地區，尤其是非洲，出口過剩的資本、生產力和基礎設施建設技

能。這裏我們有必要追問，這樣的發展又將如何重構非洲的階級、種族和國家政治結構呢？非洲在歐美領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下成為「被遺忘的大陸」後，中國能成為「幫助非洲實現大跨越良性轉變的發展動力」嗎？亦或這個過程正在發生 (Friedman, 2009: 19)？「第三世界國際主義」和「國際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遺產，無論受到何種磨損和消解，會在當前中國與非洲、阿拉伯、拉美國家、和東歐國家經濟文化交往的實踐與話語中扮演緊要角色嗎？隨着經濟文化全球化新階段的到來，更多東—南、南—南金融、科技和文化流動逐漸形成，急需傳播學者去研究並給予理論指導。任何複製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中心輻射式」權力關係的全球傳播研究，包括現有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框架，顯然難當重任 (趙月枝, 2011)。

建立一個新的世界資訊傳播秩序的理念與實踐，在 20 世紀 70 年代謀求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的運動中曾扮演過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當前的資訊資本主義時代，媒體傳播對有關地緣政治和文化認同的分界線會如何進行定義或重新定義？它們在促進在從互聯網治理到智慧財產權等全球傳播領域可能出現的抗爭美國霸權聯盟的形成過程中又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與 1970 年代不同，當下，南方各國的媒體與傳播業也已全面融入跨國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網路之中。這一事實會不會使得這些國家的媒體在致力於維持新自由資本主義秩序中唯西方壟斷媒體馬首是瞻？發生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北大西洋中心區域的「大眾傳播民主化的抗爭」(Hackett & Carroll, 2006) 和媒體改革運動會對全球傳播秩序的民主化產生何種影響？西方、南半球以及全球的傳媒民主化運動的潛在關聯與親合性又是什麼？在這些正在進行的鬥爭中，批判傳播學者們如何自我定位？冷戰時期，深處資本主義大本營的斯邁思等西方批判知識份子選擇了戴錦華 (2013) 所論及的「叛逆性的認同」，高舉起了「第三世界的反叛的旗幟」。同時，他們對「第三世界」在獨立自主發展和抗擊資本主義等方面也抱有不切實際的希望。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又有許多傳播學者把政治民主化和社會發展的希望不切實際地寄託在「跨國公民社會」身上。在 2003 年和 2005 年的「資訊社會世界峰會」上，發展中國家幾乎成了西方學者和他們認同的「跨國公民社會」反對資訊控制的防範對象。<sup>3</sup>當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業已破

產，「跨國公民社會」也已去魅，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如何定位自己與社會變革以及媒體民主化主體間的關係？中國傳播學者又如何選擇自己的學術主體性和確立自己的學術立場？

### 歷史、文化與中國「軟實力」： 在新「文藝復興」和新的「文化革命」之間？

莫斯可認為，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特徵之一在於優先考慮社會變革與歷史性轉型。然而，莫斯可也體認到，政治經濟研究「主要建諸於一種元敘事之上，這種元敘事將學科研究牢牢植根於西方白種男性智力活動的典型模式中」(Mosco, 2009: 37)。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把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殖民擴張的開始視為它的歷史「時間零點」。然而，至少兩股知識流派挑戰了這種時間觀在理論層面的充分性，並對認識「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提供了深刻的洞見。

第一種挑戰來自世界體系理論家，譬如安德烈·貢德·弗蘭克(2000)以及喬萬尼·阿瑞吉(2009)等人。這些學者要麼分析在西歐資本主義興起以前的世界經濟，並把東西方的中心——邊緣關係顛倒過來(弗蘭克)，要麼詳述西方入侵前中國的國家與市場的政治經濟情勢，闡述東亞的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阿瑞吉)，他們共同致力於去本質化地認識資本主義。緊要之處在於，他們力求避免把全球化等同於資本主義擴張(而這正是激進政治經濟學者對「全球化範式」的定性<sup>4</sup>)。他們堅持，有可能實現非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正如阿瑪蒂亞·森(2009)所言，全球化非新鮮事物，更非魔咒，而是比西方帝國主義更宏大、影響更加深遠的世界歷史過程。意識到這一點，想像後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國際主義新模式，或者「批判性世界主義」，才具有可行性。更重要的是，這應是比「移動消費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Murdock, 2006)更令人滿意的替代性願景。

通過把市場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發展相區別，阿瑞吉為有關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方向的討論打開另一扇窗。在阿瑞吉看來，以市場為基礎的發展的本質不是由資本家的存在與否決定的，而是由從屬於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權力的形成，以及在追求國外領土與市場的過程



中這一國家權力的軍事化所決定的。後者使歐洲的發展道路有了資本主義性質，而中國明、清早期以市場為基礎的發展則是非資本主義的（喬萬尼·阿瑞吉，2009）。誠然，中國當前與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融合使它如今的市場經濟制度與明、清時期的市場經濟活動有着本質上的差異。但是，僅僅這一差異無法消除如下可能性：即「權力的領土邏輯」（無論是中國國家亦或包括中國在內的轉型國家群體）或許能使「權力的資本邏輯」居於從屬地位——從而結束大衛·哈維所稱的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類型的帝國主義」（大衛·哈維，2009）。雖然阿瑞吉強調，「意識形態領域的發展不是衡量社會現實的可靠指標」（喬萬尼·阿瑞吉，2009），但是，中國國家政權繼續阻止私人資本家在意識形態和文化產業領域佔據支配地位，並繼續調用社會主義話語以使自己合法化的這一事實，依然是影響中國社會轉型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因素。社會主義話語為中國底層社會成員及其有機知識份子在挑戰新自由主義「剝奪積累」的過程中，提供了強大的話語資源與意識形態合法性（Zhao, 2008a）。就解決全球經濟危機而言，這一話語相對於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優越性」顯而易見。大衛·哈維（Harvey, 2009）曾不無幽默地指出，在美國，「哪怕有關國家干預的最曖昧的暗示都能導致政治騷動，更不用說國有化」。相反，在中國，儘管黨員官僚和新生資產階級所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已出現，但「把財富重新分配給最貧困的社會群體的政策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絕對不存在任何障礙……而把這謾罵成『社會主義』，或者更糟的『共產主義』，只會讓人當笑料」（Harvey, 2009）。當然，哈維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實際擁有的主導地位的認識，有不切實際之處。斯帕克斯（Sparks, 2009: 111）則更進一步指出，共產黨領導集體的再分配政策的出發點是「從資本家手裏拯救資本主義而不是挑戰這個制度。」這也許是對的。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這樣的動機就否定這些重新分配政策的效果，更不能因此否定社會主義話語對底層抗爭運動的意義。畢竟，社會權利需要一點一點地贏得，甚至還有可能經歷得而復失的曲折過程。正如我曾論述（Zhao, 2008a: 343），「不僅官方的社會主義口號本身，還有這些口號被各種中國社會力量的挪用，以及不斷展開的使國家和市場從屬於勞動人民社會需要的社會運動，才是中國社會主義鬥爭的要義所在」。

與世界體系理論家幾乎同步，後殖民學者則從文化角度挑戰了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深度。曼德尼(Mamdani, 2007)曾闡述，假若沒有「知識範式」的轉變，或者「知識去殖民化」的過程——即從殖民地時期與前殖民地時期的歷史深度來重新審視現在，政治去殖民化的任務將無法徹底實現：

激進政治經濟學的一個不幸趨勢在於，它易於把可用的過去簡化為殖民時期。我們應該認識到，正是後殖民世界裏的不同形式的本土主義——從種族化的黑人民族主義到種族化的民族主義再到宗教穆斯林和印度教民族主義，也即今天我們傾向於把它們叫做『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東西——首先提出這個問題。他們指責那些自我標榜的現代主義知識份子為殖民統治者的蒼白翻版。他們強調了連接起各自社會歷史的必要性。但他們唯一的問題是，他們把殖民地時期當作人為強加和對本真歷史的背離而排除在外……這樣，他們便忽視了殖民主義的制度和知識遺產在當下是如何被複製的而無法充分理解當下(Mamdani, 2007: 95-96)。

在這裏，曼德尼肯定了本土主義者呼籲全面把握歷史的訴求的重要性。同時，他也察覺到，這一訴求因本土主義者對「本真」的本質主義理解而遭遇嚴重扭曲。因此，「不是要迴避本土主義者的批評，而是要以恩格斯在他對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批評中如何理解揚棄黑格爾的方式來揚棄它；同時，不僅要在批評中考慮什麼是相關的、有效的和有利的，而且要擺脫對起源和本真的偏見」(Mamdani, 2007: 96)。

若要理解中國國家如何選擇性地利用中國本土文化傳統，曼德尼的觀點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參考框架。一方面，作為歐洲啟蒙運動和五四中國現代主義運動主流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繼承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堅定不移地建立起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並發展現代科學技術；另一方面，改革開放時代中，中華文化的特殊性和與西方文化的差異性再度得到國家與社會層面的肯定。有關「中國傳統文化有揚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能力」的文化政治宣稱最確切無誤地表達了這一情形。誠然，這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也存在一定的保守或反動傾向。某些舉措與全球化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制高度相容。正如德里克所

言，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生存不僅直接依賴於對差異的調和，更仰仗於透過再現技術將差異轉變為同質性內容的策略，這一「融合」策略只瞄準那些與資本主義擴張邏輯相容的差異化實踐活動 (Dirlik, 2002: 21)。中國不再僅僅滿足於批評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而是大刀闊斧地採納約瑟夫·奈 (Joseph Nye) 的「軟實力」概念，並通過媒體和文化機構努力使中國走向世界 (Sun, 2010; 趙月枝, 2013)。

在更廣闊的文化思想領域，有關「中國傳統文化有揚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能力」的文化政治宣稱也反映出一種不斷增強的文化自信，以及中國「能夠為人類做出較大貢獻」的雄心。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於2009年5月8日在《人民日報》海外版頭版發表的題為〈迎接新時代的『文藝復興』〉的評論文章，是體現這一話語的一個實例。作者認為，雖然西歐歷史上的「文藝復興把『人』從『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把生產力從封建社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但是，到了今天，解放了的「人」的「過度膨脹」及其「對自然過度開發」和對「社會為所欲為」，導致了「單邊主義和恐怖主義的爭鬥越演越烈」，同時，「『人』對『人』損人利己、爾虞我詐，次貸危機引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造成全球範圍的經濟衰退和恐慌。」因此，時代「呼喚着一場新的文藝復興，必須把過度膨脹的人還原為一個『和諧』的人。」作者進一步指出，中華民族在「避免人類自殺之路」方面「肩負着新的時代使命」(葉小文, 200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通篇文章裏，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制度的批判難覓蹤影，階級分析更銷聲匿跡，只有對人性淪落的泛泛批評之詞。無論我們把這視為文化自信的必要表達，亦或在社會主義話語受貶的情境下一種爭取國內外文化領導權的策略性話語退讓，又或將之視為對「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掩飾與迷惑，甚至是中華文化本質主義甚至沙文主義的表達，它都是21世紀跨文化政治經濟分析在理解「中國的挑戰」時必須面對的新文化政治。

當然，中國官方話語也沒有完全埋葬國際共產主義傳統。例如，同在2009年5月，曾發表呼喚新「文藝復興」評論的同一《人民日報》專欄就刊發了外交專家吳建民涉及這一傳統的文章。該觀點認為，隨着「中國對國際事務的發言權在增大」，在有關「世界向何處去」的討論中，「我們中國人必須一方面堅定維護和發展中國的國家利益，另一方

面又必須考慮人類的共同利益，佔領道義的制高點。」在吳建民(2009)看來，西方大國打着「民主和人權」的旗號追求本國或者一部分西方國家的利益的做法「已經碰壁」，相反，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立意很高，它不僅考慮到被壓迫的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且考慮全人類的利益，要「解放全人類」。儘管今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但是它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這是不容置疑的。在今天的國際形勢下，我們可能需要繼承這樣一個好的傳統，既考慮中華民族的利益，也考慮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我相信，我們這樣做，就一定能夠立於不敗之地，中國的崛起不僅會造福於中國人民，也會造福於全人類。

引人注意的是，作為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不斷湧現的社會矛盾的辯證回應，甚至毛澤東時代的激進話語也早在中國的網路空間和公園等公共空間以「唱紅歌」等方式復興。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圍繞「重慶模式」和薄熙來的政治與傳播鬥爭中，左翼網路網聲音受到國家權力的嚴厲打壓(Zhao, 2012)。然而，撲朔離迷的是，中共十八大後，不僅官方話語沒有如右翼知識份子所願，在對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建設採取歷史虛無主義的道路上狂奔，激進左翼意識形態在中國民間又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態勢。

斯邁思在於1971年至1972年間對中國的研究中，曾試圖向他的東道主解釋西方模式的電視系統是如何嵌入消費資本主義的威權社會關係之中的。他建議中國設計一個更民主的「雙向電視」系統，並將這一系統設想為文化大革命中作為「大眾民主」的重要傳播方式的「大字報」的電子版本。在本文開篇的引言中，斯邁思預測到了「文革」後中國社會將會集聚階級鬥爭的新動力，而這一點正是曾遭受「文革」打擊的中國官僚和精英知識份子階層深感恐懼和要極力壓制的。在中國官方話語中，更加客觀地評價「文革」，依然屬於禁忌。即便如此，中國激進民主實驗的遺產卻在一個更加多變和多元的中國傳播體系中頑強地生存下來，如線上論壇與博客就以某種形式重新啟動了「文革」時代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某些網民眼裏，作為「文

化革命的新形式」(吾將上下而求索, 2008), 這會比40年前第一次「文革」[更深刻、更廣闊], 它的目標是「探討中國發展道路」, 「進行意識形態鬥爭」, 「批判修正主義禍害」, 「揭露帝國主義的本質」以及「探討繼續革命的問題」(蘇杜, 2008)。雖然這一新形式的文化與意識形態抗爭依然處於嚴密的網路審查下, 而「文革餘孽」依舊是政治打擊的致命話語武器, 但是, 網路左翼言論的存在證明了中國革命遺產在媒體和意識形態領域複雜的官方與民間互動機制(Zhao, 2011)。斯邁思的在天之靈或許會因為這些言論而感到一絲欣慰。

### 社會主義「失敗論」之後是什麼？重新從頭再來嗎？

中國某些政治經濟精英私下懷揣的「中國夢」可能是中國替代美國成為以弱肉強食為法則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下一個霸主。但是, 這樣的夢想不僅異想天開, 而且隱含着巨大的危險。同時, 馬克思也並沒有繪製出一幅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清晰路線圖。不過, 正如我多年前在田野調查時遇到的一位廣東電影經銷商所言, 只要社會不公存在, 共產主義觀念就永遠不會過時。<sup>5</sup>一位屬於中國「中產階級」的非共產黨員持有這般觀點, 不但是共產主義觀念在中國難以被輕易抹去的印證, 也正是未必有信仰的「共產黨員」與有信仰、但未必是共產黨員的「共產主義者」的區別所在。

共產主義既是一種觀念, 又是一個回應真實世界矛盾的對抗性社會運動。同樣, 傳播政治經濟學既是一門學科, 又是一項解放性的社會歷史實踐。齊澤克(Zizek, 2009: 53-54)指出, 資本主義中有四種對抗性可能阻止它的無限擴張與延續: 「生態災難將要降臨的威脅; 所謂的智慧財產權作為私有財產的不正當性; 新科技、尤其生物遺傳領域中新科技發展的社會——倫理含義; 最後也最關鍵, 社會隔離的新形式——新圍牆和貧民窟。」在此情形下, 「新的解放政治將不再是某一特定社會主體的行為, 而是不同社會主體力量的爆炸性組合。與無產階級『除了鎖鏈, 一無所有』的典型形象相反, 把我們團結起來的, 正是我們正處於失去一切的危險」。然而, 齊澤克堅持, 前三個對抗性與文化「公共財產」和人類的內外自然相關, 而第四個對抗性, 「指涉被社



會排斥的人，無疑表明共產主義這一術語具有合理性」(Zizek, 2009: 54)。正因如此，隨着資本主義的危機在2008年以後的加深，以及世界各地那些「被排除在外」的民眾的抗爭運動的風起雲湧，從《共產主義觀念》(Ali, 2009; Douzinas & Žižek, 2010)到《共產主義假設》(Badiou, 2010)再到《共產主義地平線》(Dean, 2012)，西方學術界有關共產主義思想的討論持續升溫，傳播政治經濟學者也不甘落後，出版了《馬克思回來了》特刊(Fuchs & Mosco, 2012)。

在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在不平等的條件下融入現代世界體系的努力與鬥爭，產生了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中國的崛起。這已經引發恐懼情緒，激發了左翼犬儒主義，甚至失敗論的聲音。然而，在西方學術界，也有一種聲音表達了對中國的希望，前文以提到的阿瑞吉就是其中之一。他2007年出版的《亞當·斯密在北京》一書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對中國的發展模式進行一種新的世界政治經濟歷史分析，並希冀「以自我為中心、以市場為基礎的發展，無剝奪積累、人力而非非人力資源的流動，以及民眾參與政策制定的政府等」傳統，有可能使中國「為真正尊重文化差異的文明聯邦的出現作出決定性貢獻」。(喬萬尼·阿瑞吉，2009：392)另一方面，如果這一轉向失敗，阿瑞吉擔心，「中國很可能成為新的政治和社會動盪的中心，這將促使北方國家重建四分五裂的全球霸權的努力，或……協助人類在與冷戰世界秩序的清算相伴的暴力升級的恐怖(或榮譽)中燃燒」。(喬萬尼·阿瑞吉，2009：392)

阿瑞吉也強調指出(2009: 79)，「中國農民和工人有着在全世界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千年抗爭傳統」。正是這種傳統，以及中國在資本主義體系邊緣地帶不堪忍受的發展狀況，首先導致了中國共產黨的興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也正由於這種傳統，以及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新的不公和矛盾，引發各種各樣社會主體的抵抗在各個領域中頻頻出現：工人罷工、農民抗爭、民族騷亂、環境衝突、法律挑戰、民主遊行、地方選舉紛爭、類宗教挑戰、甚至大規模自殺(Perry & Selden, 2003)。正如齊澤克(Zizek, 2009: 55)提醒我們，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們侵入社會政治空間的名義正是「民主」。在中國，這始於20世紀上半期的一系列革命活動——它導致「人民主權」作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立國基礎被正式確定下來；今天，如何繼承中國的社會革命遺產和完成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未竟事業將成為中國走出一條超越資本主義道路，為人類文明作出新貢獻的關鍵。

正如我在本文開頭論述的，在傳播政治經濟學領域裏，西方學者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特質的學術性思考發端於斯邁思。今天，在這一領域面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挑戰，從而克服其西方中心主義和種族主義弊端，使傳播研究具有真正的國際主義和更徹底的解放性學術實踐的特質，已變得十分急迫。四十多年前，斯邁思只能靠閱讀中國官方文件並通過翻譯採訪精英知識份子和政府官員；今天，研究中國傳播的學者們已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機會，而有全球視野和中國社會歷史深度的學者也正在重新整合中外批判傳播思想和激進民主傳播實踐的資源，開拓批判研究的新視野。工作才剛剛開始。對本文所希望構建的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分析路徑來說，這的確是一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時代。

## 註釋

- 1 此文在相關英文文章的基礎上翻譯和全面改寫而成。英文版見 Yuezhi Zhao, “Challenge of China: Contribution 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珍妮特·瓦斯科 (Janet Wasko), 格雷厄姆·默多克 (Graham Murdock), 海倫娜·索薩 (Helena Sousa), 合編《傳播政治經濟學手冊》(*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第26章, 威立—布萊克威爾 (Wiley-Blackwell) 出版, 2011年, 第558–582頁。天津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陳娜博士和王亞鵬同學在英文版的最初中譯中付出了辛勤勞動, 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吳暢暢博士在文字編輯和文獻查對中做了大量工作, 特此感謝。
- 2 是上海大學的王曉明教授首先在2012年的一次會議上談到了這兩句口號的政治意涵, 尤其是後一句的國際主義意義。
- 3 有關資訊社會世界峰會中全球公民社會和國家角色的討論, 見 Bhuiyan (2010)。
- 4 Colin Sparks 的作品是這種傾向最好的範例。他認為解釋過去25年所有變化的基本範疇「不是全球化而是資本主義, 在她最新和最廣的階段」。(Sparks, 2007: 188)

- 5 有關我與這位人士以及在一部有關中國革命英雄的獨立紀錄片中和他想法一致的同輩的更詳細的描述，見Zhao (2009b)。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 喬萬尼·阿瑞吉(2009)。《亞當斯密在北京》(路愛國、黃平、許安結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原書Arrighi, G. [2007]. *Adam Smith in Beijing*. London: Verso.)
- Qiaowanni Aruiji (2009). *Yadangsimi zai Beijing*. (Lu Aiguo, Huang Ping, Xu anjie Trans.).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Arrighi, G. [2007]. *Adam Smith in Beijing*. London: Verso.)
- 戴錦華(2013年1月6日)。〈做現實主義者，求不可能之事——重訪六十年代〉。取自觀察者，[http://www.guancha.cn/Dai-Jin-Hua/2013\\_01\\_06\\_118495.shtml](http://www.guancha.cn/Dai-Jin-Hua/2013_01_06_118495.shtml)。
- Dai Jinhua (2013, Jan 6). Zuo xianshizhuyi zhe, qiu bukeneng zhi shi—chongfang liushi niandai. Observ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guancha.cn/Dai-Jin-Hua/2013\\_01\\_06\\_118495.shtml](http://www.guancha.cn/Dai-Jin-Hua/2013_01_06_118495.shtml)
- 杜宇(2009年5月21日)。〈全國農民工總量超過2.25億〉。《人民日報》，第5版。
- Du Yu (2009, May 21). Quanguo nongmingong zongliang chaoguo 225 million. *People's Daily*, p. 5.
- 安德烈·貢德·弗蘭克(2000)。《白銀資本》(劉北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原書Frank, A. [1998].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 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ndelie Gongde Fulanke (2000). *Baiyin ziben*. (Liu Beicheng Trans.). Beijing: 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Frank, A. [1998].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 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大衛·哈維(2009)。《新帝國主義》(初立忠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原書Harvey, 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wei Hawei (2009). *Xin diguozhuyi*. (Chu Lizhong Trans.).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Harvey, 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大衛·哈維 (2010)。《新自由主義簡史》(王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原書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wei Hawei (2010). *Xin ziyoushuyi jianshi*. (Wang Qi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yiwe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胡鞍綱 (2013年7月19日)。〈人民社會為何優於公民社會〉。取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719/c40531-22248498.html>
- Hu Angang (2013 Jul 19). *Renmin shehui weihe youyu gongmin shehui*. Zhongguo gongchandang xinwen wang. Retrieved from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719/c40531-22248498.html>
- 李北方 (2013年6月18日)。〈我們如何敘述中華民族〉。取自李北方部落格，<http://linan2048.i.sohu.com/blog/view/268284711.htm>
- Li Beifang (2013, Jun 18). *Women ruhe xushu zhonghua minzu*. Blog of Li Beifang. Retrieved from <http://linan2048.i.sohu.com/blog/view/268284711.htm>
- 呂新雨，趙月枝 (2010)。〈中國的現代性，大眾傳媒與公共性的重構〉。《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2期，頁1-24。
- Lv Xinyu, Zhao Yuezhi (2010). *Zhongguo de xiandaixing, dazhong chuanmei yu gonggongxing de chonggou*.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2, 1-24.
- 阿馬蒂亞·森 (2009)。《身份與暴力》(李風華譯)。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原書Sen, A. [2006]. *Identity and Violenc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 Amadiya Sen (2009). *Shenfen yu baoli*. (Li Fenghua Trans.). Beijing: Renmi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Sen, A. [2006]. *Identity and Violenc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 蘇杜 (2008年7月1日)。〈我的觀察：其實我們正在經歷第二次文革〉。取自同花順社區，<http://bbs.10jqka.com.cn/ths,5422,340115,1>
- Su Du (2008, Jul 1). *Wo de guancha: Qishi women zhengzai jingli di er ci wenge*. Tonghuashun shequ, Retrieved from <http://bbs.10jqka.com.cn/ths,5422,340115,1>
- 汪暉 (2004)。《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Wang Hui (2004). *Xiandai zhongguo sixiang de xingqi*.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 汪暉 (2008年4月27日)。〈汪暉談西藏，多元民族一體並存的中國〉。取自豆瓣小組，<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059835/>

- Wang Hui (2008, Apr 27). Wanghui tan Xizang, duoyuan minzu yiti bingcun de zhongguo. Douban net. Retrived from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059835/>
- 汪暉(2013年3月13日)。〈革命、妥協與連續性的創制〉。取自新浪網，<http://book.sina.com.cn/history/zl/2013-03-13/1746434875.shtml>
- Wang Hui (2013, Mar 13). Geming, tuoxie yu lianxuxing de chuangzhi. Sina net. Retrived from <http://book.sina.com.cn/history/zl/2013-03-13/1746434875.shtml>
- 吾將上下而求索(2008年7月2日)。〈網路民主開啟了文化革命的新形式〉。原取自烏有之鄉，現已被刪除，具體可參見<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532363/>
- Wu jiang shangxia er qiusuo (2008, Jul 2). Wangluo minzhu kaiqi le wenhua geming de xin xingshi. Retrieved originally from Wu you zhi xiang. Refer to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532363/>
- 新華社(2009年1月19日)。〈西藏人大通過決定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取自[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9-01/19/content\\_10685449.htm](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9-01/19/content_10685449.htm)
- Xinhuashe (2009, Jan 19). Xizang renda tongguo jue ding sheli "Xizang baiwan nongnu jiefang jinianri". Retrieved from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9-01/19/content\\_10685449.htm](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9-01/19/content_10685449.htm)
- 陽雨、謝光軍(2009年5月15日)。〈阿爾及利亞的中國傳奇〉。《人民日報》，第8版。
- Yang Yu, Xie Guangjun (2009, May 15). A<sup>1</sup> erjiliya de zhongguo chuanqi. *People's Daily*, p. 8.
- 姚新勇(2009)。〈身份認同與漢藏衝突〉。《21世紀》，第111期，頁114-122。
- Yao Xinyong (2009). Shenfen renting yu han zang chongtu. *21 Century*, 111, 114-122.
- 葉小文(2009年5月8日)。〈迎接新時代的「文藝復興」〉。取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05/08/content\\_11334338.htm](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05/08/content_11334338.htm)
- Ye Xiaowen (2009, May 8). Yingjie xinshidai de "wenyi fuxing". Xinhua net. Retrieved from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05/08/content\\_11334338.htm](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05/08/content_11334338.htm)
- 吳建民(2009年5月31日)。〈吳建民：世界向何處去〉。取自搜狐網，<http://star.news.sohu.com/20090531/n264238989.shtml>
- Wu Jianmin (2009 May 31). Wu Jianmin: Shijie xiang hechu qu. Sohu net. Retrieved from <http://star.news.sohu.com/20090531/n264238989.shtml>
- 趙月枝(2011)。《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Zhao Yuezhi (2011). *Chuanbo yu shehui: Zhengzhi jingji yu wenhua fenxi*. Beijing: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chubanshe.
- 趙月枝 (2012年6月26日)。〈全球化背景下的傳媒與階級政治〉。取自文化縱橫網，<http://www.21bcr.com/a/shiye/shijieguan/2012/0627/3334.html>
- Zhao Yuezhi (2012, Jun 26). *Quanqiuhua beijing xia de chuanmei yu jieji tongzhi*. *Wenhua zongheng net*. Retrieved from <http://www.21bcr.com/a/shiye/shijieguan/2012/0627/3334.html>
- 趙月枝 (2013)。〈國家形象塑造與中國的軟實力追求〉。《文化縱橫》，第6期，頁52-59。
- Zhao Yuezhi (2013). *Guojia xingxiang suzao yu zhongguo de ruanshili zhuiqiu*. *Wenhua zongheng*, 6, 52-59.

英文部分：

- Ali, T. (2009).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New York: Seagull.
- Alhassan, A. (2004). Communic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nation-state: A new political economic research agenda. In Semati. M. (Ed.),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 (pp. 55-70).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Arrighi, G. (2009). The winding path of capital: Interview by David Harvey. *New Left Review*, 56, 61-94.
- Badiou, A. (2010).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D. Macey, & S. Corcoran, Trans.). London, New York: Verso.
- Chakravartty, P., & Zhao, Y. (2008). *Global communications: 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Cheek, T. (2006). *Living with reform: China since 1989*. London: Zed Books.
- Dean, J. (2012). *The communist horizon*. New York: Verso.
- Desai, R. (2008). Introduction: Nationalisms and their understanding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rd World Quarterly*, 29(3), 397-428.
- Dirlik, A. (2002). Modernity as history: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globaliz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modernity. *Social History*, 27(1), 16-38.
- Douzinas, C., & Žižek, S. (Eds.) (2010).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Verso.
- Friedman, E. (2009) How economic superpower China could transform Afric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4, 1-20.
- Fuchs, C., & Mosco, V. (Eds.). (2012). Marx is back: The importance of Marxist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today. *Triple 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10(2), 127-632.
- Guback, T. (1994). Editor's note. In Smythe, D.,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pp. 227-30). T. Guback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Hackett, R. A. and Carroll, W. (2006). *Remaking media: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tic public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 Harvey, D. (2009, February 12). Why the U.S. stimulus package is bound to fail. Retrieved 2009, March 23, from <http://www.socialistproject.ca/bullet/bullet184.html>.
- Jessop, B (1991). On the originality, legacy, and actuality of Nicos Poulantzas.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34, 75–109.
- Li, M. (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mis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Lin, C. (2006).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amdani, M. (2007).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In Shaikh, N. (Ed.), *The present as histo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pp. 94–10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osco, V.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urdock, G. (2006). Cosmopolitans and conquistadors: empires, nations and networks. In Boyd-Barrett, O. (Ed.), *Communications media globalization and empire* (pp. 17–32). Eastleigh, UK: John Libbey Publishing.
- Nordenstreng, K. (2001). Epilogue. In Morris, N., & Waisbord, S (Eds.), *Media and globalization: Why the state matters* (pp. 155–60).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Panitch, L. (2002) The impoverishment of state theory. In: Aronowitz, S., & Bratsis, P. (Eds.), *State theory reconsidered: Paradigm lost* (pp. 89–104).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erry, E. J., & Selden, M. (2003). Introduct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Perry, E. J. & Selden, M.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pp. 1–22) (2nd ed.).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Pieterse, J. N. (2009). Representing the rise of the rest as threat. *Nordicom Review*, 30(2), 55–68.
- Prashad, V. (2007).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Schiller, D. (1996). *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iller, H. I (1976).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 Smythe, D. (1981). *Dependency road*. Norwood, NJ: Ablex.
- Smythe, D. (1994). After bicycles, what? In Smythe, D.,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pp. 230–244). T. Guback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Sparks, C. (2007).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ass media*. London: Sage.

- Sparks, C. (2009).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by Yuezhi Zhao.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1), 109–11.
- Sun, W. (2010). Mission impossible? Soft power, communication capacit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 54–72.
- Wang, H. (2006). Depoliticized politics, from East to West. *New Left Review*, 41, 29–45.
- Zhao, Y. (2008a).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Zhao, Y. (2008b). Neoliberal strategies, socialist legacies: communic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In Chakravarty, P. and Zhao, Y. (Eds.), *Global Communications: 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pp. 23–50).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Zhao, Y. (2009a). Communication, the nexus of class and nation, and global divides: Reflections on China's post-revolutionary experiences. *Nordicom Review* (Jubilee Issue), 91–104.
- Zhao, Y. (2009b). Rethinking Chinese media studies: history,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e. In Thussu, D. (Ed.), *Internationalizing Media Studies* (pp. 175–195). London: Routledge.
- Zhao, Y. (2010). For a critical study of communication and Chin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 544–551.
- Zhao, Y. (2011). Sustaining and contesting revolutionary legacies in media and ideology. In Heilmann, S., and E. J. Perry (Eds.), *Mao's invisible hand: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pp. 201–23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Zhao, Y. (2012). The struggle for socialism in China: the Bo Xilai saga and beyond. *Monthly Review*, 64(5), 1–22.
- Zizek, S. (2009). How to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 *New Left Review*, 57, 43–55.

## 本文引用格式

趙月枝 (2014)。  
〈中國的挑戰：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芻議〉。  
《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8期，頁151–179。